

胡先骕农业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王思明,刘启振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作为著名植物学家的胡先骕极为重视国家的农业问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农业思想,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农业为促进人性发展的最佳职业;土地政策为国家经济命脉,应包括限田、均税、规定农田分割的极限以及减租等四项要政;积极推进农业合作事业,大力发展农业金融;提倡注重经济植物学研究,充分利用我国植物富源;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方法多方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些观点都具有相当的先见之明和借鉴意义,在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诸多方面都给我们以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胡先骕; 农业思想;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经济植物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6924(2014)01-0106-11

Hsien-Hsu Hu's Agricultural Thoughts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WANG Si-ming, LIU Qi-zhen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As a renowned botanist, Hsien-Hsu Hu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s agricultural problems and formed his own unique agricultural thoughts which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ive main aspects. That is, agriculture was the best career which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Laid attention to economic botany research, made full use of natural resource in China plants; Land policy was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China, which should include four major policy, such as restricting cropland, sharing tax equally, stipulating for the limit of cropland division and rent concession; Multilateral efforts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scientific method; And promoted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usiness actively, developed of agriculture finance. These ideas have great prospective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Hsien-Hsu Hu; agricultural thoughts; economic plants; land policy

胡先骕(1894—1968年),字步曾,号忏龠,籍贯江西新建,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享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建国后曾被毛泽东同志两次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1]。胡先骕儿时即有“神童”之誉;他于1913年考入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农学院,先学农艺,后转入植物系;1921年,刚刚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柳诒徵特聘胡先骕为该校农科教授;1923年,他再度赴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继续执教于东南大学,并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植物部主任,从事研究工作。其时,他与秉志等人一起合作成立了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然后又亲自主持创办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

收稿日期:2013-11-02 修回日期:2014-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7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1ZDIXM013)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招投标项目(2012JDXM015)

作者简介:王思明(196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史、比较农业史和农业遗产研究;刘启振(1981—),男,硕士生,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史和农业遗产研究, E-mail: njauliuqizhen@163.com。

物研究所^[2]。1940—1943年,胡先骕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成绩斐然,在其努力下,中正大学名家汇集,成为一时之盛,诸多学科均为当时学界翘楚。胡先骕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一起被誉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八位知名大学校长”。1948年,他当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与江西籍吴有训、陈寅恪等院士齐名^[3]。此外,他在历史、文学、地理、语言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诗词方面的著述极为丰富。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胡先骕的名字、事迹及其学术贡献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胡先骕学术思想的研讨已有所启动。胡先骕的植物学成就、文化思想、品格风范、教育思想、诗词成就、科学思想、生态思想、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有不少学者做了一定的探究,成果丰富,于此不再赘述,但是他在农业方面的主张和贡献却鲜有问津,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胡先骕在农业方面的论述可散见于其《论国人宜注重经济植物学》(《科学》,1924年第9卷第7期)、《经济植物学与中国农业之关系》(《农学周刊》,1929年第1卷第15、16期)、《四川农村复兴问题之讨论》(《科学》,1934年第18卷第4期)、《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植物之富源》(《科学》,1936年第20卷第10期)、《三民主义与自然科学》(《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1年第2卷第9期)、《经济植物与农业之关系》(《正大农学丛刊》,1942年第1卷第2期)、《中国生物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科学》,1943年第26卷第1期)、《科学研究与中国新农业之展望》(《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4年第4卷第15期)、《经济之改造》(《观察》,1947年第1卷第20期)、《论中国今后发展科学应取之方针》(《科学时报》,1947年第13卷第1期)等文献中。国立中正大学初办时仅有的3院之中就开设有农学院,9个系中就包括农艺、森林、畜牧兽医等3个涉农科系。胡先骕支持农学院创办了农场、牧场、林场、动植物培育园,又陆续建立了昆虫、植物病理、果树、农作物、造林、森林利用、寄生虫等研究室和实验室^[4]。此外,还创办有农科学术刊物《正大农学丛刊》。所有这些都可见胡先骕对农学教学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胡先骕经常被邀去给中正大学的农学会讲课,阐发自己在农学方面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依旧非常关心我国农学科研教育的发展情况。195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的胡先骕撰文^①介绍金陵大学农学院、南京大学农学院、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及西北农学院等8处农业教学和科研机构,对各单位的创建始末、发展沿革、隶属变更、研究成果等都作了简明的记述^[5]。胡先骕认为,“一切农业学科如农艺学、园艺学、森林学等,莫非植物学之应用”^[6]⁴⁸。植物学为农学之根本^[6]⁴⁹。因此,从一个植物学家的视角去审视农业发展,其思想还是很有特色的,对目前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农业科学发展等重大课题都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缘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胡先骕的农业思想作一个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和探讨。

一。“农业实为最佳之职业”

在社会的各种职业中,胡先骕认为农业和手工业最不妨害人性的发展,原因是它们“富有创造性与美术性”。农民终年所得虽然仅仅能填饱肚子,但是他们可以自由计划和安排生产,其管理与创造才能可以充分体现,尽管身为佃农,生活相对贫苦,仍然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是自身的主人。并且工作内容和时间可以变换,有特别辛劳的时候,也有特别闲暇的时候,“三季辛勤之结果,满仓满箱,皆个人才智之代价。‘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②,一饮一啄,皆自己所创造,且日与大自然相接,倍感精神上之愉快。苟收入不至过于鲜少,则农业实为最佳之职业。”^[7]⁴⁵⁰⁻⁴⁵¹

为印证此观点,胡先骕又将农民与矿工及其他流水线上作业的产业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做了对比,矿工、大工厂里生产线上的工人一年到头都在从事极其单调乏味的一种工作,其机械性与他们所操作的机械工具类似,没有丝毫的自由性、创造性和美术性。这种工作除了要求一定标准的熟练外,不能运用他们一点聪明才智。这些工人所做的工作仅作为整个生产的一部分,对于最后的成品来讲,他们无法得到创造性、成就感和美感的满足。这种职业的单调性最能妨碍个人的发展。工业国家的工人虽然物质生活优裕,却没有精神生活。早晨起来就要开始最单调乏味的工作,下班后只有饮酒、赌博或追寻低级

①原作未写完,后经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宗刚先生根据胡先骕手稿整理而成。

②出自唐·杜甫《赠卫八处士》一诗。

趣味的娱乐。这些产业工人既然终身从事机械工作,则自己已经变成一种活的机械。如若让多数国民都如此,那么整个民族就很容易退化,这是近代文明最大的危机。故我们在改造国民经济时,不能不深思熟虑这个问题,及早预防这种隐患^{[7]451-452}。

就政治地位上来说,胡先骕指出,农民在阶级冲突往往败北并非是因为力量弱小,而是他们散居乡间,难于团结,故而每每处于劣败地位。然而在欧洲亦有所谓“绿色革命”运动,在若干国家,农民党的势力亦不可侮;美国工会固然有伟大的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也能够左右政治。在中国古代谈政治者也多数持有重农主义思想。所以,农民阶级也应该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工业建设固属切要,农业现代化尤为当务之急^{[7]450-451}。

在担任中正大学校长期间,胡先骕勉励教师既要注重教学,又要注重研究,还要经常带学生去接触社会,深入农场、农村,鼓励学生到学校附近的村庄教农民、儿童识字认字,去了解人民大众,去拥抱大自然。有一次,当他听到农学院部分贫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的“四教村”开荒种菜以弥补生活费用不足时,激动得竟然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清早胡先骕就赶赴“四教村”,一面看望住在这里的张肇骞、李静涵两位教授,一面参观同学们种的蔬菜、瓜果,啧啧称赞道“好!好!”^[4]

胡先骕之所以认为农业为促进人性发展的最佳职业,一方面与我国传统的“重农崇本”思想影响有很大关系。胡先骕出身官宦世家,家学渊源,从小饱读儒家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国学造诣颇为精湛。20世纪20年代,胡先骕与梅光迪、吴宓等东南大学教授共同发起组织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术文化刊物《学衡》,他是主笔之一,由此成为“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另一方面,该思想也是其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具体体现。胡先骕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见解,能独立思考,他指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失去价值,要使社会进步,须保持人性的均衡发展,要将西方尊重科学和个性的潮流与东方传统的古典主义沟通起来^[8]。新人文主义盛行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主要代表人物为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年)等,新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的法则”来取代“物的法则”,目标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批判者。胡先骕第一次留学美国时即接触到了美国正在流行的新人文主义,白璧德曾受邀在哈佛大学美东中国留学生年会上演说,演说之大旨首先由胡先骕译出,名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于《学衡》1922年第三期。由于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是相通的,因此,他很快又接受了新人文主义,并把新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9]。终其一生,胡先骕都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植物学家。难能可贵的是,他虽是一位科学家,在生物学上信奉达尔文主义,但他并不倡导唯科学论,而力主新人文主义^[10]。

二。“土地政策,实为全国经济之命脉”

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农立国,85%以上的人民都以务农为生,所以胡先骕认为,“土地政策,实为全国经济之命脉;而重农主义,亦为我国之主要经济思潮。”尽管以后我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农民所占人口的百分数要比当前少1/3或者1/2,然而农业终究是我国人民的主要职业,而土地政策毕竟能影响半数以上的人口,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造必须先从树立健全的土地制度入手^{[7]455}。

胡先骕极为痛恨兼并土地,认为这是中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他系统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情况,进行了有力的鞭挞。上古之时,土旷人稀,土地公有,私人在井田制或类似它的授田制下使用土地。及至战国之世,人口大增,政制复杂,授田制无法维持,土地终归私有,地主阶级肇兴。其时土地集中的情形至为可骇。入汉以后,兼并日甚,萧何、张禹等大吏带头强买大量民田,汉武帝也乐此不疲,其他王侯将相更是趋之若鹜。此种颓风为有识之士所痛心,故董仲舒有限田之议,王莽创王田之法。然终以积重难返,议固不行,法亦颠覆。直至五胡乱华之后,杀戮相接,土地荒芜。后魏孝文帝创立均给天下人田之制度,北齐、北周下逮唐初均斟酌采用。“然日久贵族之风又作,虽有禁令,不救世弊。均田之制,至此而夭。至宋时朱勔有田多至三十万亩,自是言改革者不能均田,但求均税。舍本逐末,于兹可见。贾似道之收买公田,徒贻笑柄。元季献田赐田苛虐,明代之投献颁赐,至使土地集中勋戚之手。弘治中,徽、兴、岐、衡诸王田多至七千余顷。”畿辅有五座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入清则圈地以给旗兵,而亲王贵主亦各给圈地自百余亩至千余亩不等,其余官吏莫不以购买土地为殖产计。“至晚晴如毅军将领之为皖北大地主,张作霖、吴俊升辈之为东三省大地主,皆其著例。民国以来四川军阀竞买成

都平原之田,赵恒惕在湖南买田万亩,湖南赣人某氏有湖田数万亩,则今日之大地主也。大地主之外,尚有无数之小地主,各有田数百亩至数千亩不等。”此皆达官贵人士豪富商所置之永久产业,因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故各省佃农数额占全部人口22%~66%不等,而占总人口1.5%的地主每每占据田亩44%以上。佃农占总人口的45%,却仅拥有8.9%的田亩。半佃农要占到总人口的35%以上而仅仅占有21.59%的田亩。自耕农只占人口总数的7%,共占有总田亩的25%。这种情形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广东、成都平原尤甚。故以全国言之,8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其中又有半数即40%以上的人口为农奴式之佃农。“终年手胼足胝不能维持一最低之生活水准。全国经济问题之严重,殆未有逾于此者也。”^{[7]455-456}针对当时农民所遭受的四大痛苦:土地兼并严重、税额不均、人均垦地面积过小以及佃租过重,胡先骕提出了中国的土地政策应包括四项要政:即限田、均税、规定农田分割的极限以及减租。

首先,胡先骕认为在苏俄实行的土地公有而集体耕作的办法在中国不宜推行,因为苏俄土地平坦空旷,并且农奴制改革不久,人民已经习惯于在大地主的农场里集体耕作。但是,“在中国除东三省与华北平原外,大半为水田,而在山区,则为梯田,不宜大规模集体耕作。尤以中国农民习于独立之小面积耕作,集体耕作,非其所愿,特难实行。”所以现在要进行土地改革,应该“以限田与励行耕者有其田为第一义”。他根据当时的国情和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我国人均占有农田应以100华亩为限,最多不能超过200华亩。若将限田之外的田地收归公有,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激烈的手段,“即政府可发行土地公债,以购回逾限之田。”另一种是比较缓和的措施,“即政府不强迫收买逾限之田,而以累进遗产税之方式,征收逾限之田亩,至仅逾一或二顷而后已。”政府所征收或者以公债征购来的逾限田亩,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论价卖给农民或退伍军人,只是必须“以自行耕种为限,而分给之田亩至少不得在五十亩以下”。若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政府可尽行征购所有不自耕种之田。这样才能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7]458-459}。

其次,均税与限田同等重要。税额的不均是中国农民一个极大痛苦,“自省而言,江南之田赋‘甲于天下’,而四川之田赋特轻,一省之中,税又不均”^{[7]457}。而导致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田之经界不正,“欲达到均税之目的,首须经界”^{[7]459},“经界乃土地政策之第一要务也”^{[7]458}。测量是经界的唯一方法,土地呈报的数据基本不可靠。可以在全国进行航空测量,然后慢慢进行三角测量作为最后参考,这项工作虽然极其繁重,却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还必须进行细致的人口普查工作。土地与人口经过详细调查以后,则大户飞粮隐税等诸多弊端即可杜绝。此外,还要进行两项极其繁重的工作,一是根据各省经济状况修定该省的税额,使各省税额标准统一;二是根据土壤肥瘠、水旱情形,将土田分为五等,从而规定税额的多少,此举需要动员许多土壤学家和农学家精心勘察^{[7]459}。

再次,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尤其是因为人口众多与耕地不足,造成了中国人均垦地面积过小:近42%的农民占地10亩以下,占地超百亩者不超6.6%。并且,中国又存在诸子平分家产的习俗,这就使得耕地分割漫无限制,每户的田地经过几代就减少到不能维持生活了^{[7]457}。所以,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定土地分割的最小极限,低于此限则不能再进行分割,而且由长子继承的土地面积最小极限不能少于30亩,最好能将这个极限提高到50亩。这样会致使农家有一部分子女不能继承父母的遗产,这些无产者应由政府出面帮助其就业。施行这项制度肯定会遭遇极大阻力,甚或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倘若在国家经济繁荣时,这倒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农民甚至有可能不愿意耕作这30或50亩小面积的农田。同时,政府应该想方设法“使小农得以增购农田至限田法最大之限额,必如是方能养成多数小康之农民”^{[7]460}。这样一来,好处有二:一是明确规定了人均耕地下限,使耕者有其田,有效解决了农民生产者与土地这个关键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稳定了农村社会;二是和平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使其成为无产的产业工人,为城市的工业生产补充了丰富的劳动力。

最后,佃租过重是农民的另一痛苦。中国小地主剥削佃户更胜于外国的大地主,同时,地主又经营高利贷,这对于贫苦的佃农来说又多了一层剥削,“故中国佃农之苦,殆尤甚于外国之农奴”^{[7]458}。胡先骕认为,国民政府实行的“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照原租额减去25%)尚嫌不足,必须规定田租的普遍最高额,在此基础上再减去25%方才公允。“而一切附带之超额征收如小租、租鸡、租鹅、力役等,概须禁绝。”并且,收租必须以实物为根据,或许能够依据年成进行公平分配,必须严禁征银包租等陋习。如此佃农才能有来苏之望。然而,减租毕竟只是过渡时代的权宜之计,如果能真正实现耕者

有其田,那时也就无租可减了^{[7]460}。

三、积极提倡农业合作、农业金融与组织农民消费者组合

胡先骕主张推进农业合作事业要居农业政策要图的首位,这也是其农业思想中的一个亮点。农民最大的痛苦大约有两点:一是需款时借不到薄利贷款,必须向土豪劣绅借高利贷,或者提前出售青苗,横遭剥削;二是收获时无法存储以等待比较好的价格,而不得不贱卖。因此,农政的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合作组织,同时扩充农业贷款,“使农民得以合作社社员之资格向农业银行以低利贷款以应急需,以及改良农业之用”。另外,必须“大量组织合作仓库”,从而使农民收获来的农产品由合作仓库代为存储保管,待善价而沽,这样就不致受牙行市俗剥削,使农民获得大实惠。再次,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 85%,是我国最大的消费阶级。所以要为消费者谋福利,首先必须为广大农民谋取消费福利,那么就必须尽量扩大农民消费合作社,使之遍布全国。消费合作社之单位既多,会员自众,若组织得法而有杰出人士主持,即可形成一种伟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而足以左右资本与劳工两阶级,使之皆不能垄断而牺牲农民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的消费者组合曾有大规模的组织,并附有实验室以调查检验全国之商品,而与以公平正确的估价。任何会员都可以自组合获得每月的检验报告,上面列举有各种货品的评价,使消费者不致受欺。此种报告不但可以取缔劣货,亦可为货真价实的商品作宣传。如果这个组合的势力遍及全国,则整个社会都会普遍受益,工商业作伪之风气可以矫正,各业的广告费也可以节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农民消费者的负担。总之,务必使农民在消费方面得到最多利益,而受到最少剥削。最后,若能进一步由消费合作社集合消费者的资金组织生产机关,使为消费而生产,则资本家与商人垄断的弊害可以减至最小程度,农民受惠愈大,不流血的经济革命亦可达成,而此尤为农民政策中之要政也。“此种事业苟经营得法,自可无限发展,国人其勉之!”^{[7]464-465,468-469}

四、繁荣农业必须注重经济植物学研究

胡先骕是一位植物学家,他从自己所从事专业的角度提出,欲繁荣中国农业,必须注重经济植物学的研究,进而充分利用中国植物的富源,这可看作是其农业思想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

(一) 经济植物学研究与农业发展休戚相关

谈及国人争相贩卖欧美花木,而无视我国原产园艺植物,利弃于地,胡先骕每每扼腕。他说,“近年与欧美交通,乃争种洋花,甚至本为中国原产之报春花乃转而取之于他人之手,此最可笑可悯之事也。又如行道树则竞种桧悬木又成法国梧桐与洋槐,而中国固有之树见栽培者,则惟垂柳一种。最习见之榉树舍外国人栽种于上海、芜湖、汉口各租界外,吾国人乃无一利用之者。”这就是“有地利而不知用”,“国人不不以此为学问,听其自生自灭”。各省所立农业学校与农事试验场应抓紧从事研究中国之经济植物的事业,从而光大我国的农艺和园艺,而不能只是“稗贩西人之唾余”。^{[6]61-62}胡先骕认为,“吾人所需者,为一种公共机关,如英国之克由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美国之阿诺德森林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以植物学家司之,每年派遣采集员赴内地采集种子、枝条以供繁殖之用,而以其结果贡献于社会。吾知经济植物学之发达,亦即农艺园艺学发达之日也。”^{[6]66}应该说,这是他后来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思想渊源和重要动机。

(二) 改良种植已利用的经济植物,调查提倡未利用的经济植物

关于如何充分利用我国的植物富源,胡先骕主张,“处在一切都需要科学化的今日,我们对于已利用的经济植物,应该研究其改良种植的办法,使其获得最高效果;对于未利用的经济植物,应该加以调查和提倡,使民众的生产能力提高,使国家的富源增加。”^{[6]263}

已利用的经济植物,如粮食“从我们现有的农作物中,一定还可以另行产生更优良的新混合种,极需我们继续不断的研究。”又如草场草,如果能由本地的野生禾本科莎草科中选出美观而竞争能力强大的种类来种植,结果一定能超过娇嫩而易为杂草夺取地位的舶来品。

对于未利用的经济植物,比如药用植物方面,“中国的每一乡村中,差不多都存在着一些连《本草》中都没有记载的草药,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具有令人不敢置信的特效的。倘若加以大规模的调查及研究,一定更有重大的发明。”又如杀虫剂,“除虫并不是没有药物,可是从国外运来的药物,一来是价值太昂,

二来是不一定适宜于有些中国特有的昆虫。所以我们必须由本地的有毒植物中去发现杀虫剂,才能为农民所普遍应用。浙江昆虫局研究用巴豆杀虫,极见效果,而毒鱼藤、莽草根等草药,都有杀虫的效力,不过还没有经人详细试验罢了。”再如海藻,有的可供食用,有的可供药用,我们应进一步调查它们的作用,并设法开展人工繁殖,使之变为海底的黄金。^{[6]272}

总之,胡先骕极为看重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他说“植物的富源,当更富于金矿。因为世界上金矿有开发完尽的一天,而植物的宝藏则愈用愈多,永无绝灭!而且利用植物富源的实业,大的可以供国家办理,小的可由人民自行经营,伸缩性颇大,最有利于农村经济。当此我国国民穷财竭的时期,如果要恢复国民经济的元气,开发植物的富源当然是最有效方法之一”^{[6]272}。

五、主张科技兴农,多方努力增产增收

作为一个科学家,胡先骕自然非常清楚科学技术之于现代农业的巨大作用。我国数千年来皆以农立国,在农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利用粪肥而能保持地力至数千年而不竭,长久以来都为国外农学家们所称赞,“但一般人不知应用科学,不努力于阐发原理,甚且具有‘科学是神秘的’错误观念,无怪中国农事不振,殊为可惜。”“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利用天赋的地方和才力,来建设一番新的大事业。”^{[6]210}

胡先骕指出,“我国利用植物富源远胜于任何其他之民族。据美国农部之研究,欧美人食用植物约一千余种,中国之食用植物则有二千余种。此亦中华民族足以自豪者。然以科学不发达,农业全凭经验,故农产品质与量皆非欧美甚或日本之比;而我国动植物资源尚未能完全应用;能输入栽培之外国农作物与畜产,亦未能尽量输入;农产品工业化之工作,亦未能积极以科学方法促成之。每年病虫害对于农产品之损失亦极浩大。故欲尽量增加农业生产,则尚须利用科学方法,自多方面努力,方能奏效”^{[7]460}。于是,他主张采取如下方法来发展农业生产:

(一) 发展农田水利

水利工程为立国之要政,水道之整理,灌溉之建立,水力之利用,不仅可使交通便利,“农工两业,亦以此为根基”。国民政府成立后,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如修复郑国渠使关中瘠壤化为膏腴,淮河水利的告成,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沿岸的积年水患^{[6]324}。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最重视的就是沟洫制度,所以水利工程可以算作是“周秦两代物质文明之最高表现”。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水利事业,“除陕西开渠及导淮两项工程外,尚少其他之大规模计划,黄河与扬子江水利多年失修,浙江海塘且有崩溃之忧。而在西北各省,地下水尚日趋于下降,沙漠日渐南侵,隐忧之大莫此为甚。而在若干地区如吉林,其池沼地尚待疏泄。至于内地各小河川之待疏浚与筑蓄水池以利灌溉,其待修水利工程之多则尤不可胜述。又如扬子江口外,暗沙之面积极大,如兴建大规模之海塘排水工程,则不但崇明岛可与大陆相连,且可增加数县面积之膏腴之地;其经济价值,难以亿计。故以后改造中国之经济,必须积极兴修水利。水利若修,则黄河、扬子江之水灾可免。耕地之面积可以大增,西北行将变为沙漠之区,可供农耕之用。若干接近水源之地区,可将旱田改为水田,而倍增单位面积之农产量。在扬子江流域因蓄水池之兴建,每年一熟之稻田,可改为二熟。若遇旱年,旱灾可免。凡此种种,百废待兴,治河导淮与兴建宜昌水闸,不过其荦荦大端而已。此等工程之重要,不在兴建重工业之下也。”^{[7]462}

(二) 保持土壤与增加肥料

由于人类滥伐森林,滥用土地,许多肥沃土壤都变成了不毛之地,民族随之衰亡,文化也因之灭绝。胡先骕举例指出,古代埃及、巴比伦文化的灭亡,土地皆成沙漠,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唐代三藏法师前往天竺取经的时候,经过西域和中亚地方,看到很多殷实繁盛的国家,但是现在的新疆已经大部分变为不毛之地,人口亦不过四五百万,关外的内、外蒙古也多成沙漠状况。这就要求科学家研究保存土壤的问题,发明各种好方法使良田沃壤不致变为沙漠,而反使不毛之地逐渐变成良好的土壤^{[6]313}。利用森林以保持土壤,利用地形耕作及分条耕作种种方法,在中国西北各省有大规模推行的必要。建国初期,全国掀起生产高潮,但当时的人们多数并未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毁林开荒无度,森林被大量开发破坏,大批原始森林消失,而次生森林一时又难以恢复,土壤遭到严重侵蚀,很多动植物面临毁灭绝种的危险。同时,林区的环境将有强烈的变化,许多的林间草本植物将不能生存,而许多动物亦将受到影响。胡先骕因此强烈主张从速开始保护天然纪念物的工作,“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各植物研

研究所、动物研究室、地质研究所、地理研究所，会同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与内务部，共同组织一保护天然纪念物委员会，拟定计划与章程，并协同各省人民委员会作全国性的天然纪念物的调查与保护”^[11]。只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个号召并未引起多大响应，殊为可惜。

“民以食为天”，食的最重要问题在粮食增产，而粮食增产与肥料有直接的关系。土壤中的肥料因多年栽培农作物会使用殆尽。幸好我们中华民族总算是会保存土壤肥料的民族，因为我们农人数千年来都普遍利用人的粪溺肥田的缘故，所以人口虽然众多，耕种虽然勤勉，土壤中的肥料还是勉强能够保持，然而究竟嫌不足，而且很不卫生，易于传染疾病。外国除利用牲畜的厩肥外，还须利用智利硝、鸟粪一类的肥料，我国的硫酸铈制造刚刚萌芽，人民使用肥田粉的习惯还要慢慢养成。再者，我国农民保存粪肥的方法还有改进之处，因为按照平常窖藏法，很容易损失粪肥中 1/3 的氮。若粪肥中和以土与植物垃圾之类，则粪肥中的氮可以保存，臭气亦可免去，而蛆虫与蛔虫卵亦可因植物腐烂发热而杀死，以避免传染多种疾病^{[6]312-313}。总之，我国人民虽然知道利用粪肥可以保存地利，但是因为处理粪便不得其法，氮肥的损失不可亿计。这需要将土壤学家新近发明的处理粪便的方法在农村进行推广，才能弥补一部分肥料的不足。另外，大规模制造化学肥料，尤其是农业政策的急务，这还要寄希望于化肥工业的建设^{[7]461}。

(三) 改良及改种作物的品种

积极改良各种作物的品种进而推广开来，乃是农业建设的最重要的工作。改良品种的方法不能墨守成规，除正规育种法之外，植物学家和育种学家也可以用各种植物腐碱与用放射线原子能来引起新突变的发生。如果完全改种不同的品种，有时甚至能产生农艺上的大革命，例如宋代引种占城早稻就是一个著例。中国有稻诸省中大多种植籼稻，但是如果改种粳稻，则不仅产量大增，而且稻子的品质和价值也将大增。贵州全省多山，粮食不足，但是英国的春麦在贵州就可以大量种植，从而足够供应全省粮食的需求。“又如四川松潘理番及西康等高寒之处，粮食不足，即寻常之马铃薯亦不能种植，但可输入南美洲安得斯高山区之野生耐寒马铃薯种以杂交法改良马铃薯之品种，使能生长高寒之区，而供给此区人民之粮食。”诸如此类研究，皆适合以卓越之眼光与方法来从事，不可固步自封。至于果品蔬菜，各省每有特异之嘉种如甘肃醉梨，新疆哈密瓜，山东肥城桃等，以及可以栽植的野生品种，“皆宜广为搜罗繁殖改良推广，使佳种随地皆有，则为农人造福多矣。此外则外国优良作物果品蔬菜之品种，亦宜尽量移植，于此亦可农家之财富”。这项工作需要“添设经济植物研究所一类研究机关，专司其事，以补救农业实验所之不及”^{[7]462}。

(四) 农产品工业化

胡先骕明确指出，“农产工业化为农业增产一种最重要之工作。”这里主要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是食品的工业化，也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增加食品的贮藏性，例如以著名的果品、蔬菜、水产、肉类、乳品、粮食等，制成罐头、腌腊乾菜、早餐品、冰冻鲜品等；二是改变食品形式而增加其价值，如制果酒果汁、制酱油、制假奶油、假猪油、代咖啡、咖喱粉、人造蛋和人造肉等。我国东九省素来以出产大豆而著名，但是除了榨油、磨豆腐外，剩下的豆饼仅仅用来肥田和饲养牲畜，殊属可惜，这种豆饼的蛋白质含量极其丰富，如果加以精制，就能制成非常美味的食品。另外，如果利用化学方法将桐油饼除去所含的剩余桐油，则其中的无毒蛋白质至少可以用来饲养牲畜。“茶油饼，花生油饼，棉油饼，莫不皆然。”又如，云南、广东、广西等省普遍种植热带产的参荜，这种植物可以制成珍珠粉，其他可以制造珍珠粉的植物淀粉如何首乌粉、天花粉等也有很多，如果能加工制造，即可销往海外。广西不产葡萄，有人却用当地特产桃金娘的果实酿成代葡萄酒，非常出色，这个可以在华南地区开创一个新的实业。从事这种研究和加工，可以大大增加农产品的价值。第二层是加工精制工业用的农产品，“如以桐油制油漆，以豆饼制可型物人造羊毛，以魔芋粉制雨衣布，以柏油制肥皂，及利用竹木草秆等等以制造纸张玻璃纸人造丝可型物等等”，这都可以使价格低廉的工业用植物一跃变成高价的工业品，这种工业能够为国家增加大量财富，工业家们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努力^{[7]462-463}。

(五) 退耕还牧，发展畜牧业与渔业加工

中国西北及内蒙康藏一带是非常理想的畜牧地区，将这些地方的牧地垦作农田必然会引起沙漠的增加和牧地的减缩，“乃最不智之农业措施”。在西北广大区域，如何退耕归还牧，乃是农政之要图，有赖于政府制定并施行贤明的畜牧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繁殖以及改良肉用牲畜。大力发展乳牛业，改良

乳牛品种及利用科学方法进行乳制品生产加工等,若能处置得当,则大可增加我国人民食用乳类食物的数量,对于国民经济、国民健康都有莫大裨益。而且改良毛革工业,尤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7]464}。

至于渔业方面,我国海岸线绵亘数千里,海洋水产资源极其丰富,渔民亦至为坚忍耐劳,利用传统的粗放捕捞法每年都能出产大量水产,倘若采用现代捕捞工具进而改良捕捞方法,则水产产量必可明显增加。并且,如果能大量制造水产罐头,改良腌制及冷藏的方法,那么就能大大增加海产品的销路,更重要的是,这对我国国民健康大有裨益。另外,我国的诸多大江大河及各大湖泊都水产富足,与海洋渔业类似,如果能改良捕捞、繁殖、制罐以及冷藏等各种生产加工技术,也可以增加渔业生产和销路。关于人工养鱼,胡先骕尤其推崇稻田养鱼的方法,主张大力推广,建议组织专家并拨付专门经费开展这个研究事业^{[7]464}。发展“稻田养鱼”这个思想是颇具前瞻性的,这已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2005年5月16日,中国浙江省青田龙现村的稻田养鱼,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世界农业遗产进行保护。由此,有关稻田养鱼的研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12]。胡先骕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可见其眼界之高远。

除以上五点外,改良仓库建筑,防治仓谷害虫及其他病虫害,从而减少农产品的损失,积极奖励农学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创造等也都是农业政策中的要目^{[7]464}。它们的功用与增产一致,属于开源节流的另一方面,同样需要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六、胡先骕农业思想的现实启示

胡先骕的农业思想尽管主要是立足于民国时期的国情所形成的,但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所走过的艰苦探索之路和当前实际,仍可看出他的一些主张还是极具前瞻性的。下面仅就与当前“三农”发展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三点启示略作探讨。

(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综观胡先骕关于土地政策的论述,归根结蒂还是集中在“耕者有其田”这个宗旨上,主张土地国有化,不赞成私有,因为私有化极易导致土地兼并,这正是胡先骕明确反对的。他曾设想,“凡……公用事业皆属于国家,农地使用权……则托付与私人,任期自由经营,而异累进制之所得税与遗产税以节制资本,则一方面可以鼓励人民之经济活动,一面亦可以防止资本主义之流弊矣。”^{[7]463-464}

在我国,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现在,土地都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农民的主要财产和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开创新的生产生活门路的主要资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有效的土地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为了确保广大农民不丢掉土地这个“命根子”,以致重蹈土地兼并的覆辙,我们绝对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而应该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即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灵魂所在,是国家农村政策的基石,因此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要毫不动摇、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只有如此,方能跳出中国历史上土地政策“均田——兼并、集中土地——再均田”的怪圈。

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应属于农民家庭。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接下来还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探索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多种形式,并不断规范和保护土地经营权、继承权、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各项权益,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效益,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3]。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同时,有一条原则必须强调,那就是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继续强化耕地保护的经济机制,提高耕地占用成本,引导城镇建设利用非耕地资源和挖掘现有用地潜力。

(二)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农民是农业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他诸要素必须通过农民这个主体才能发挥作

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够解决我国未来“谁来种地”的现实问题,更可以有效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伴随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和基础性的战略任务。胡先骕的农业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农村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把城镇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逐渐形成了“只有没出息的人才会留在农村”的错误观念,以及“务农难致富,外出经商才能发财”的片面思想,成为目前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的重要社会心理原因。因此,要吸引有志于现代农业的青年选择做职业农民,就要营造尊重农民、重视农业和关心农村的社会氛围,抛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偏见和行为,这是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社会心理环境^[14]。

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大力倡导文化建设,加强社会舆论引导,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大众传媒大力宣扬农业的重要性和农民的光荣感。具体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致力文化氛围营造。我国有非常悠久的重农文化传统,农民在历史时期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历朝历代都提倡“耕读传家”,农民处在“士农工商”的第二阶层,仅次于政府官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江河日下,农民成了弱势群体,变为贫苦、愚昧的代名词,饱受歧视。从事农业耕作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社会地位低成为许多人“跳出农门”的初衷,也是新生代农民不愿留在农村创业的重要原因。应该让社会大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年人清楚这一历史事实,将扭曲已久的畸形认识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使“农民”这一职业称号重获应有的荣誉和自信。第二,进行生活质量比较。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用水紧张、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城市问题,工薪阶层饱尝其苦,长此以往,对人自身可谓贻害无穷。而反观农民则不会受此折磨,诚如胡先骕所言,他们每天都与大自然接触,可以自由计划和安排生产,工作内容和时间可以变换,劳逸结合,从而使其管理与创造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倍感精神愉悦。

(2) 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使之成为有前途的产业。农业有利于人性的发展,“农业实为最佳之职业”此为胡先骕所秉持的一个鲜明观点,但他同时又提到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收入不至过于鲜少”。从事农业生产收入过低是大量新生代农民离开农村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仅仅从思想认识的层面对农民“恢复名誉”、正本清源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获得较高收入,种粮有利可图,能赚大钱,这样才能显著增强农业的吸引力。新型职业农民的收入可以通过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政府的扶持得以实现;要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门槛,实行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使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可以想见,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将使农业成为收入稳定、受人尊重的职业,其发挥的示范带头作用,有利于吸引有志农民回到土地上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三农”事业中去,保持农业的长久稳定发展^[14]。所以,这就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农业种植比较效益过低、农业生产风险过大的现状,持续推动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使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幸福农业转变,改变传统农业“苦、累、脏、穷”的形象,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从而使更多有志青年投身于农业生产经营,成为新一代职业农民。

(3) 开展农业教育,全面提升农民职业素质。如果农民仅仅拥有大量钱财,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知识文化,还称不上新型职业农民,充其量只是个“土豪”(当下流行语)而已,根本得不到社会真正的认可与尊重。我们所要培育的职业农民,是指“有知识,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这就要求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力军应该接受全面的农业教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活动不仅仅限于农业生产领域,还涉及到土地规划与利用、开拓销售市场、品牌建设、农产品的储存与加工和发展多功能农业等,现代农业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责任观念、效率观念。因此,需要专门的培训机构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特殊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为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提供有效的培训与教育服务。即除了国民序列教育外,还要进行全面的关于农业的教育,主要应该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农业历史文化、农业经营管理、农业政策、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

总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的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我们的农业后继有人。

(三)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有鉴于胡先骕的相关论述,我们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纵向来看,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农业家庭经营始终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是以家庭或部落为单位,进行着采集和狩猎以及简单的农业生产。在奴隶社会,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组织奴隶进行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农业更是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时期。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工业革命把家庭农业纳入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轨道,却未把农业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改变,农业顺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以一种新的面貌,即资本主义“家庭农场”的形式出现。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的集体农庄失败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失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家庭经营为主体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15]。

(2) 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社。应该着力扶助基层农技人员、大学生村官、种养大户、农村经纪人等领办创办的农民合作社或各类专业服务组织,鼓励农技人员和大学生到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组织任职,提高合作社和各类专业服务组织为农服务能力。广泛动员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参加各类农民合作社,促进农民合作社跨越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特色,积极培育蔬、果、林、渔、畜、禽等特色产业农民合作社;着眼粮食优势产区,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农民合作社;还要进一步完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支持农村各类经营主体在农产品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第二、三产业环节兴办农民合作社。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形式组建农民合作社,发挥合作社流转土地的平台作用。鼓励龙头企业领办农民合作社,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围绕粮食、果蔬、畜禽、渔业、种子等优势产业,引导同区域、同行业、同类型农民合作社以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在劳动、资本、技术、产品、品牌等方面开展联合与合作,组建农民合作社联社。发挥农民合作社联社带动产业发展的龙头作用,承担行业协调、自律、服务等功能,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组织化水平。积极探索成立农民消费合作社,从实际情况出发,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竞争能力。这样做,一来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二来可以构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开拓农村市场;三是解决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以农民合作社为基本主体的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就地、就近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农业全程服务。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质量认证、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农田水利设施维修保养等服务。积极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扶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以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为取向,重点实行统一生产规程、统一管理、统一品种种养、统一渠道销售,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推进统防统治,确保农产品绿色、安全与可靠。

总之,成立农民合作社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农民的生产经营风险,提高农民的市场交易地位和谈判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兴村富民的目标,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

(3) 强化农业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财税支农政策,促进支农项目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对接。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资金支持。在名优产品评比、项目承担、经营许可等方面,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对待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各级示范农民合作社倾斜,随着财力的增强要稳步增加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专项资金。加大公益性农业社会化服务资金扶持,县级财政应将农技推广经费标准列入财政预算,并按规定使该资金逐年增长。创新税收管理方式,落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把农民合作社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并作为单独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

在财政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要给农民合作社联社更多的支持、更大的优惠。各种涉农项目要向农民合作社联社倾斜,优先委托农民合作社联社承担和实施。探索建立农民合作社发展共同基金,构

建农民合作社融资担保平台。推行农民合作社授信贷款制度,加大示范社授信等级和额度,努力满足农民合作社开展生产经营的贷款需求。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扩大险种和覆盖率,逐步实现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全覆盖。

今后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一是构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能够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共同发挥作用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资本流入。二是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充分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作用。三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政策,通过贴息、减税等形式,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村贷款,增加对农村的资金供给^[16]。

七、结语

综上所述,胡先骕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身上,现代科学的理性认知、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染和诗人的感性体验融合在一起,使他对于大自然抱有亲切而深挚的情感^[17]。农业可谓与大自然关系最亲密的产业,故而胡先骕认为农业是所有工作中最佳的职业,最不妨害人性的发展,其对农业的感情亦显而易见。综观胡先骕的农业思想,其中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这与元代以来农学家们“重农尚利”的农业经营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又包括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意识,还是新人文主义“人性”精神的具体体现。尽管出身于官宦世家,但他对地主阶级没有丝毫偏袒,坚决反对土地兼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民所遭受的四大痛苦。胡先骕站在世界近代农业发展的最前沿,旗帜鲜明地主张把农业发展作为国富民强的基石,从国家、民族大义阐发他所认为合理的土地政策,把变革生产关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农业的前提和首要条件,从而准确抓住了近代农业发展迟滞问题的关键所在。此外,还主张采用较温和的非革命手段解决农村人口过多的难题。同近现代大多数怀有忧国忧民之心的科学家一样,胡先骕也希望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来推动国家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注重经济植物的调查、研究和加工利用,强调改善民生,利为民所用,群策群力繁荣农业经济,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胡先骕的农业思想由于历史原因虽一度湮没,但仍不能漠视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414-415.
- [2]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 [3]万绍芬.缅怀中国植物学之父胡先骕[J].创作评谭,2009(6):28-29.
- [4]柳志慎,胡启鹏,李红.原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博士的风范——缅怀永远的老师[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1):163-168.
- [5]胡先骕.近世中国农业研究机构概况[J].中国科技史料,2004,25(1):1-17.
- [6]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下卷)[M].南昌:中正大学校友会,1996.
- [7]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上卷)[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 [8]李德成,方卉.守望传统 回归人文——胡先骕人文主义思想刍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92-97,106.
- [9]周葱秀.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首次倡导——重新评价胡先骕的文学观[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8(1):23-29.
- [10]黄且圆.植物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胡先骕[J].科学文化评论,2010,7(2):107-124.
- [11]胡先骕.应该设立保护天然纪念物的机构[J].科学通报,1957(9):288.
- [12]曾芸,王思明.稻田养鱼的发展历程及动因分析——以贵州稻田养鱼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79-83.
- [13]翁贞林,朱红根,熊小刚,等.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95-98.
- [14]朱启臻,闻静超.论新型职业农民及其培育[J].农业工程,2012,2(3):1-4.
- [15]刘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以家庭经营为主体[J].中国发展观察,2013(5):38-41.
- [16]翁贞林,朱明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J].农业经济,2003(10):8-9.
- [17]王先霭.胡先骕的生态思想[J].云梦学刊,2011,32(3):5-8.

(责任编辑:黄平芳,英摘校译:吴伟萍)